

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

蒋子丹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悲伤的水流经慈的河

蒋子丹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编 审：刘 明
责任编辑：郭良原
封面设计：谭 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蒋子丹著.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0709-147-9

I. 当… II. 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1700 号

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

蒋子丹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

深圳彩帝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3000 册

ISBN 978-7-80709-147-9 定价: 32.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风 中

- 3 两代人的驿站
- 6 母亲的礼物
- 8 我们家的摇滚青年
- 23 复数史铁生
- 31 句号，另起一行
- 33 沉默与微笑
- 38 七月过去，她没回来
- 40 瞬间即逝
- 42 最后的土匪
- 49 影子一样的蛊婆
- 57 一家人和一只狗
- 60 后 话

第二辑 路 上

- 75 如是我见
- 89 从一个人用文字构筑的遗址出发
- 95 在不可知的运程中
- 100 伤情共此时
- 107 枫丹白露黑猫
- 112 在冰岛想念蔬菜
- 118 无语之旅

- 122 远方的白水
125 在水一方
127 偏爱小城
129 呼应之间

第三辑 窗 前

- 133 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
142 萨帕塔的关键词
152 1975 年记事
158 读王平
163 有大美而不矜
165 本色的力量
168 年少的苍凉
169 意外之外
171 阳光下的记忆
173 杂文的难处
175 自序《黑颜色》

第四辑 月 下

- 179 遐想死亡
201 有感阳光岛
203 离 别
205 岁月之约
217 一个人的时候
227 那天晚上
234 双向的沉重
245 结束时还忆起始

第一辑 风 中

两代人的驿站

1983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为搜集我父亲蒋牧良的旧作，以备出版社重新出版之用。

在南京路的上海图书馆，我逐页查阅一摞摞被岁月尘封的杂志报纸，忙不迭招呼每一篇父亲署名的文章，呵，原来你在这儿呢。父亲已经在十年前作古，他的著作和手稿也都在文革中失散，对我而言，这个生我养我的人，正日渐一日抽象成一个符号，从我生命中淡出。可是，随着那些发黄发脆的纸片在我眼前展开，父亲逐渐在他的旧作里复活。可以说，我对父亲精神与文学的了解概始于斯。

那些天的南京路是漫长的，那些天的图书馆是沉郁的。傍晚时间，闭馆的铃声响过，我走出那间地板有些摇晃的阅览室，听守库的老先生，咔达一声将两扇厚重的门锁上，就仿佛又经历了一次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我从那个世界里走了出来，把他留在黑暗和寂静里。

我走到了大街上。初春的街树刚刚长出小小的嫩芽，湿润的风徐徐吹来，昏昏沉沉的额头，像被搽了清凉油一样爽然。归家的上海人，个个心无旁骛，朝着将为自己开启的门，将为自己亮起的灯步履匆匆。只有我，漫无目标地游走在外滩高楼的夹缝里，或者淮海路里弄的屋檐下。夕阳的光线像源自一盏渐渐暗去的灯，短去了锋芒，我用脚步丈量的每一寸景象，都那样的结实和陈旧，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五十年前父亲的目光触摸过它们。

1936年，父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小说集《锒砂》，作为文化生活出

版社的“文学丛刊”之一种出版刊行。主编巴金先生在丛刊的前言中说，我们的丛书，“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个丛刊里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以购买。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已经可以窥见这个同盟的面容，年轻而自信，忠实于文学，不屑于商利，并且关怀着社会的底层。鲁迅、巴金、茅盾、张天翼、欧阳山、吴组缃、艾芜、沙汀、萧军、靳以、曹禺、郑振铎、李健吾、荒煤、芦焚、何其芳、丽尼……这些曾经照亮了我们眼睛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在文坛上出道不久的写作者，被这样朝气蓬勃的阵营所接纳，会给他的创作带来怎样难得的动力，况且还有敬如父兄的鲁迅先生，在青年人围坐一旁的时候，划上一根火柴点燃了烟卷，同时也点燃了他们心中那个叫作方向的东西。这个方向即使在先生故去之后，还被父亲和朋友们坚定地信赖着。父亲与欧阳山先生执掌着“鲁迅先生殡仪”的横额，走在为先生送灵队伍前列，他们留在照片上那前行的姿态告诉了我。

然而，事实上，八·一三事变的硝烟，很快暗淡了那个悲痛的行列中残存的希望，上海沦陷了，大伙风流云散，父亲也在日寇占领当局的通缉之下，逃离去了大后方。当他与张天翼一起，坐着颠簸的破汽车西行的时候，他的长篇处女作在上海的某个印刷所的排字间，被战火化为了灰烬，连一个字也没留下，而他自己也再未回到上海来。

在我的履历表上，1983年是我开始从事文学写作的第一年，想来与这次搜集父亲旧作的经历有关。不过那时候，我并不曾料想，上海将是我们父女两代人共同的文学驿站，甚至于起点。父亲一生重要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上海发表，迄今为止，我自己重要的作品《黑颜色》、《左手》、《桑烟为谁升起》也都发表在这儿，更要紧的是，我也曾跟父亲一样，在出道之际感受过被一个文学阵营接纳的鼓舞。这个阵营同样年轻而自信，忠实于文学，执着于艺术的追求和探索，不屑于商业炒作的利益。记得

那几年在长沙热闹的文学聚会上，上海来的人，上海来的信，上海来的杂志和报刊，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名篇与喝彩共生，实验与批评共荣，这个地方总是吸引着全国有志作为的文学青年，总是捧出文学最新的思考和成果，在某种意义上，重现着五十年前的辉煌。对那个时期的写作者来说，上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贴近和亲切的。每个写累了晚上，站到窗前望上一望，总觉得在看不见的什么地方，有一片灯光为文学亮着，那有可能就是上海。

在我的印象里，被法国梧桐浓荫遮蔽的建国西路看上去朴素而僻静，秋风一吹，五角型落叶就铺满了人行道。上海文艺出版社招待所的存在，赋予了这条路特别的意义和潜在的能量。普通不过的一座民宅，清静整洁的一间间小屋子，每天都在迎接全国各地的作家。两位恪尽职守的老师傅，全天候坐在门房里，听这些人上上下下的脚步敲打木质楼梯，便可以知道他们愉悦或者沮丧的心情，而那心情所牵系的东西，多半在一页页稿纸之上。我曾经多次出入于那座小楼，寒流袭来的下午，从外边蒙头蒙脑跑回来，会看到传达室老师傅贴在房门上的留言，告诉你今天有谁来过电话，可能是《收获》的肖元敏或者《上海文学》的杨晓敏，也可能是《文汇月刊》的肖关鸿或者《小说界》的魏心宏，而门的下方，正有一瓶刚刚冲好的开水，等着你拎进去暖暖和和地喝。

隔开多年再去上海，所闻所见与最初的感受自然是大不相同了。高楼、工地、热气腾腾的商战和引领时尚的消费，是这座万家灯火的大都市最富特征的布景和当仁不让的主角。我在一片陌生里漫步街头时，想起一些些文学的陈年旧事，也只关乎我和我的同辈们。第一次来上海拜访过的前辈，如王西彦、赵家璧、钱君匋等先生早已辞世而去，巴金老人在病榻上缠绵多年尚未解脱，而我已经不会再去什么地方寻找父亲的足迹，甚至连一种寻找的心情业已不存。

母亲的礼物

1996年的平安夜，我的母亲去世了。在那个处处闪烁着圣诞树彩灯，回响着祝福歌声的夜里，我亲手把母亲推进了殡仪馆的冷藏柜。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母亲不可能跟我一块走入下一个年头了。可是我还得走。

家于是也在这个新年里变得空荡荡。我和母亲一同喂养了八九年的老白猫，在母亲紧闭的卧室门前转来转去，喵喵叫着。它不明白，那个每天坐在轮椅上，受着病痛的折磨，还总是强撑着逗它玩，关心它吃喝拉撒的慈祥老人，为什么不管它了。

我把咪咪抱过来，一百遍对它说，那屋里没有人了，她走了，不在了。白猫睁大眼睛看着我，目光里充满着疑惑，然后固执地挣脱我的怀抱，再一次回到那扇紧闭的门前去，趴在那儿一动不动。

五天以后，我走入了1997年，第一个没有了母亲的新年。

没有了母亲的新年，空旷如暮色里正落着雪刮着风冰凌在衰草上格格结着冻的荒原。似乎什么都被母亲带走了：热气腾腾饭食可口的家宴，围炉而坐兴致盎然的长谈，相互对视中从容会心的微笑，以及祈盼来年事事如意的好心情……四十多个新年，母亲从不会忘记给予我的一切，她都给带走了。

1997年的元旦，我和老白猫对望，共同守护着关于母亲的记忆。

在病危的时候，母亲曾经嘱咐过我，叫我把她的骨灰送回湖南去。在远离故土的海岛上，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属于她的那方旧门墙。

那间位于长沙市一条由僻静而繁荣的街道上的普通公寓，曾是我永远不会厌倦、时时期待着要去投奔的地方。

多少年了，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是清晨还是夜半，只要我敲响那扇门，都会有母亲朗声的应答在等着我。假如哪一次没有人来应门，那就尽管到通往菜市场的路边去迎候吧。果然不一会儿，母亲的身影就从小街口上转了过来，一方咖啡色毛围巾，一袭黑呢子短大衣，一篮子沉甸甸的菜蔬，还有日渐佝偻了的背影和日渐迟缓的步伐。

1998年新年来临之际，我捧着母亲的骨灰，又敲响了那扇油漆斑驳的旧门。一锅一碗一桌一椅，甚至连椅子上的由母亲亲手缝制的绒布靠枕，都依然如故。所有的一切都没改变，而母亲却成为了遥远的记忆中，一个朦胧而温暖的影子，可望而不可及。我对着那个小小的红木盒子说，妈，咱们回家了。

当又一个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不能从千里之外回到湘江之畔的故里去，只能让我的思念去探望母亲，去看看那座青草业已一度枯荣的坟茔。

窗外，一切与节日有关的喧闹全都退去了，有的只是寂静中与母亲重逢的温馨。从她离我而去的那个新年开始，我年年都收到她给我的一份无形无声的礼物，这是一份将使我的生命一年年丰厚的馈赠，这件礼物的名称叫怀念。

我们家的摇滚青年

小披头士的出生

2002年初夏，雅虎和其他一些中文网络的音乐网站，都在热炒北京铁风筝乐队推出的一张摇滚专辑《这是我们的秘密》。作为一个带着特殊的关切阅读那些乐评的读者，我心里的滋味与其说是喜出望外，不如说是喜忧参半，尽管乐评人的评价非常之高：

“铁风筝”乐队是中国最老牌的新音乐乐队之一，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强力新秀的姿态出现，并在后来的时间里通过频繁的高质量演出巩固了其作为国内一线乐队的地位。乐队的音乐是典型的以吉他、贝司、鼓为基架的传统乐队音乐，讲求流畅优美的旋律、精妙的编配与直指人心的歌词。

乐队主唱虞洋不但拥有极富磁性的嗓音和超凡的音乐创作才能，还在吉他演奏方面拥有极深的造诣，他曾经接替了“唐朝”乐队的吉他手Kaiser成为“唐朝”乐队的第三任吉他手，而以为他灵魂人物组成的“铁风筝”乐队，也已成为中国新一代“吉他英雄乐队”的典范。

要是我说，我与这支乐队的关系始于29年前，所有人都会置疑。

那时候摇滚乐被当作西方“垮掉的一代”颓废文化代表，干脆彻底地拒绝于国门之外，中国正在流行的是八个革命样板戏，有多少人知道摇滚乐呢？可我还是要说，的确如此。

29年前盛夏某天，从北京回到娘家待产的大姐，在长沙妇幼保健院顺利分娩，产下一个七斤重的男婴。那时我们的父亲刚刚去世，全家人还没有从痛失亲人并饱尝世态炎凉的灰暗心情中走出来，这个孩子的出生就像一缕亮丽的曙色，带给我们非同寻常的温暖与宽慰。姐姐姐夫给他们的儿子起了个叫着上口听着响亮的名字：虞洋。

大姐出院的那天，我到婴儿室去办手续，透过玻璃窗看见里边的长条摇篮，一大排正在安安静静酣睡的孩子中，只有一个小Baby正在哇哇大哭。哭声向我传递了一种强有力的召唤，就是他！果然，护士拿着我出示的卡片，核对了几个婴儿手腕上的号码之后，从中间抱出来的正是张嘴大哭的那一个——原来他屁股上糊着一大泡尿。

当护士把刚刚出生三天的小外甥郑重地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心中的那种奇妙的感觉至今难忘。他刚刚洗过澡，像一条蜕皮的幼蚕似地脱下医院白不滋拉的襁褓，换上一件红底白点的小和尚衫，在我怀里舒舒服服地享受着人生最初的幸福时光，并像要抒发这种幸福感似地发出高亢响亮的叫声。除了与众不同的大嗓门，这孩子还长着一头所有新生儿都不曾拥有的浓密黑发，长度业已覆盖了耳垂。当20年后，我得知虞洋放弃了大学一年级学业，不顾一切开始了前途莫测的摇滚生涯时，突然体味到这一幕所具有的强烈象征意味，他不是一出生就已经用小小披头士的形象和大嗓门暗示了我们，摇滚对于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吗？

大姐休满了56天产假，一天不敢耽搁回北京上班去了，把他们的小儿子留在外婆家。从此，洋洋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核心，外婆、舅舅和姨都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外婆是全天候保姆，根据大姐临走时留下的一本科学育儿教材，不管白天晚上，两小时喂一次水，四小时喂一次牛奶，牛奶中还得按一定比例兑水稀释。曾经亲手养大了六个子女的外婆，虽然对这些教条深表怀疑，也不敢擅自更改。虞洋成年之后，对自己一

米七五的身高不大满意，说这全是小时候喝稀牛奶喝的。那年代食品紧缺，订下的一斤奶必须在每天清晨到一站地以外去领取，于是，因脑炎后遗症成了弱智人的舅舅，当了洋洋的专职取奶员，不论严寒酷暑，每天天不亮必起床出发，晚了小外甥就可能挨饿。我这个小姨呢，正好中学毕业在家待业，下不下乡还无定论，理所当然成了一个“见习妈妈”，洗洗涮涮蒸蒸煮煮之外，整天围着小外甥转，他哭了哄他笑，他笑了陪他玩，他病了抱他去看医生。然而这个漂亮聪明的小男孩带给我们的快乐，像功效强大的染色剂，把这一切辛苦漂染得绚丽多彩，令身在其中的人流连忘返。当他长到两岁左右回到父母身边后，就成了我们隔山隔水的牵挂。当然其中最牵挂他的，还是屎一把尿一把亲手带大他的外婆。

1996年12月24日，虞洋的乐队来海口参加某广场平安夜演出，这使得他有机会看望多年不见的外婆。谁也没想到这一次会面中，外婆与虞洋的对话，竟是重病在身的八旬老人临终前几小时与亲人最后的交谈。瘫痪在床的外婆发了几天高烧，精神已经很差了，虞洋的到来仿佛给她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灯注入了新的燃料，苍白的脸上竟出现了一种神采焕发的红润。祖孙两个整整一下午长时间谈话的过程里，虞洋一直弯腰坐在外婆身后，让外婆靠着他的背而坐，并且不断应她的要求调整高度和斜度。这一幕到今天还让我历历在目。虞洋从小就不乖巧，不会用好听的话取悦什么人，懵懵懂懂的青春一过，更加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一切以自我感受为中心，从不重视与他人的情感交流，难免让关心他的人觉得有些没心没肺。可是在那个诀别的下午，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充满感情的一面。外婆仍然像对小孩子说话那样嘱咐她的外孙，说，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他们带你不易。虞洋郑重点着头，答应着外婆，与他一贯的叛逆风格全然两样。分手的时候，虞洋跟外婆约定明天再来看她。可是外婆没有时间等到他再来，当她静静地吐出最后一口气时，虞洋还在去演出现场的路上。对这个特殊的外孙子，外婆其实放心不下，她最后所说的几句话，多数跟虞洋有关。“他怎么跟谁都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她说。

特殊儿童轶事

虞洋的确从小就是一名特殊儿童。

在他长大的过程中，虞洋带来的快乐曾经那样完整地覆盖了我们相关的记忆。比如在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大叫说，妈妈，我肚子痛，可能是要生孩子了吧？又比如说，在七八岁的时候，他忽然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她会弹钢琴。他把小女孩的名字告诉我，又千叮咛万嘱咐，你可得替我保密。他也会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转眼间将爸爸刚刚买回来的吃食，变成一堆果核纸屑塑料袋，还有满院子享受过共产生活的孩子们狂欢般的笑声；当妈妈大汗淋漓忙出了一顿好饭，扯着嗓子把他从某个角落里唤出来的时候，却被他告知已经在邻居家用窝头咸菜大碴子粥撑圆了肚皮。

在学校里，虞洋是个聪明孩子，却不是个乖孩子。他完全不懂得师道尊严，经常向老师提些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且不顾场合。记得他读小学二年级时，教育局领导下到他们学校听课，语文老师经过精心准备，讲解一则烟囱和烟的寓言，全文大意是赞美烟囱脚踏实地的形象，批评烟轻飘飘的作风，在故事结尾，高高在上的烟正向地面上的烟囱夸耀自己的眼界呢，一阵风来把它给吹散了。老师在总结时对她的学生们说，你们瞧，烟一骄傲就被风吹散了吧，所以同学们切记不要骄傲。虞洋马上举手要求发言，问，老师，要是烟不骄傲它不也会被风吹散吗？老师当堂被晾在讲台上，不知怎么回答他。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大姐不止一次被老师传去谈话，希望她管住孩子不要老是在课堂提这些旁门左道的问题。有次大姐去晚了，教室已经锁了门，只见虞洋正趴在门口的垃圾桶上抄课文呢。看见妈妈，虞洋万分委屈说，老师讲解蜜蜂和蚂蚁的故事，说蚂蚁和蜜蜂虽然都勤劳，但蚂蚁劳动为自己蜜蜂劳动为人类。他就质疑说，蜜蜂酿蜜本来也是为了它们自己呀，只不过是人类利用了它们的劳动呗。同学们被他引得哄堂大笑，老师因此以破坏课堂秩序为由，

罚他抄写课文一百遍。

对虞洋这些轶事，我那时是把它们当成轻松的笑话来听的，听完之后，留下的印象仍然是快乐，只有快乐。现在想来，这些听来轻松的笑话里，其实包含了许多沉重的东西，后来虞洋对正规学校教育的逆反心理，很可能就是从这一次次被我们忽略掉了的过节中生长出来的。单一的快乐是长辈们的失误。

我知道，作为北京大学这样名牌学府的毕业生，供职于高等科研机构的姐姐姐夫对他们独生儿子前途的设想，一直是读大学读研究生或者到国外去留学。只不过比起一般科研人员，他们还多出一点浪漫情怀。他们都出身于知识家庭，又都是西洋音乐爱好者，并且当年是在北京大学业余手风琴队里开始了他们的恋情，这使得他们对少年虞洋沉迷于音乐的状态多了一些理解。读小学的时候，虞洋已经有了自己的小提琴和电子琴，爷爷家的钢琴、黑管、长笛等一应俱全的西洋乐器，要是他想摆弄也垂手可得。到他成为一名中学生以后，家里的各种音乐磁带和唱片更多得哪儿哪儿都是，只要虞洋在家，家中那台当时在国内还十分少见的大型立体声录音机就分分钟开着，遇上可心的曲目，虞洋也是听它千遍不厌倦。等到他的父母发现儿子对音乐的痴迷，实际上已经影响了他的学业时，一切已经为时晚矣。

虞洋没有按人们预计的那样顺利地考上大学，尽管他初中二年级就曾经参加过北京市海淀区电脑软件编程比赛，还获得过名次。经过一番周折，虞洋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专业注册为自费生，终因不能按时上课和参加考试半途而废。这种情形让他的父母开始苦恼，不管他们对儿子的业余爱好怎么理解和包容，儿子的行为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底线，虞洋与父母的冲突在所难免。于是有了虞洋的厦门之行。

成长的苦恼

差不多十年之后，我在网上的乐评中看到了对虞洋此行的简单陈